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三一期 ——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12c)

【林案追踪】	“九一三事件”中与技勤八团有关的几个细节	蓝 岭
【书刊序跋】	《林彪日记》后记	李 德
【文革一页】	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	丁龙嘉
【名人后事】	陈伯达后事处理始末	王文耀 • 王保春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 (三)	舒 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林案追踪】

“九一三事件”中与技勤八团有关的几个细节

• 蓝 岭 •

于鹏飞的《256坠机事件中不可忽略的细节》提及，“技侦八团”侦听到飞机“发动机空中起火”，“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了，掉下来了”，以佐证飞机是在蒙古被击落，据了解，事实并非如此。以下为涉及该团的几个历史细节。

1、据空军有关历史资料，于文中的“技侦八团”，当时的正式番号 of 空军技术勤务第八团，简称技勤八团。该团自1969年12月在山西大同成立之日起，即归军部亦驻大同的空军第十军建制领导，1976年6月，改属北京军区空军领导。从1969年12月至文革结束，技勤八团都不归军委空军情报部直接指挥。

2、据“九一三”当天在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值班的一位知情者透露：9月13日凌晨技勤八团侦收到的情报显示，蒙军雷达的确侦测到了256号飞机进入蒙古领空，但在蒙古军方尚未来得及实施阻止其继续飞行的措施前，目标即已消失，仅此而已。

3、有关“目标消失”的情报，并不能直接判断为目标坠毁。承前所述，技勤八团既没有侦收到蒙、苏军方对256号飞机有何应对措施的情报，更没有侦收到诸如“发动机空中起火”，“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了，掉下来了”一类的情报。

4、技勤八团所获情报，按规定同时上报空十军司令部、北空司令部、军委空军司令部及总参。有关256飞机的情报，并没有亦不可能在任何一级受到截留。旁证是技勤八团的历史资料亦称：“1971年9月准确侦收破译了……的情况，在关键时刻为党中央、毛主席提供了可靠情报，多次受到空军、总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虽然这些话有夸大其功劳的成份）。

5、于文称“这些情报从此就像没有出现过一样”与其下文“李（指李德生）对昨晚空军情报部的工作印象深刻，非常满意，夸奖贺：‘你这个情报真厉害！’”是自相矛盾的。

6、“九一三”后空军组成的专家组完全有条件参考和利用技勤八团的情报。事实上是这些有限的情报对分析坠机原因并没有直接的帮助，而并非如于文所说空军专家组对这些情报“未曾加以考虑”。

~~~~~

## 【书刊序跋】

### 《林彪日记》后记

• 李 德 •

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之际，《林彪日记》与海内外广大读者见面，我感到由衷的快慰。林彪元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早已彪炳史册。本书是我为缅怀为新中国诞生而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林彪元帅及其他战友们，追念其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中建立的丰功伟绩，抱着对林彪元帅客观公正的拳拳之心，与知名作家舒云一起努力劳作，反复推敲，数易其稿，历经20余载而编著的一部百万字长卷。原拟在林彪元帅百年诞辰时出版，未能如愿。现付梓出版，我心中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终于了却了平生夙愿。

本书采用纪实手法与日记形式，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彻求真务实原则，重在客观公正地记叙林彪元帅的战斗历程和光辉业绩，并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披露于书中。凡书中写到的历史事件、作战行动，请示报告、军事思想等重大问题，都坚持以确凿可靠的资料为依据，全书加有注释以尽量使其言之有据。凡涉及野史、演义之类描述林彪生平活动的说法一律不予采用。在纪实林彪元帅生平活动的同时，侧重突出其作为军事家的军事生涯和人物特征，以及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对非军事活动则从简。对林彪元帅的军事论著、力求根据所能搜集的大量相关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等第一手资料，为读者提供全面、系统、客观的珍贵史料。

我个人既不属专家学者，也不专门研究林彪问题，且早已年过古稀，之所以20多个春秋寒暑不辍，如此执着编著此书，全凭着曾在林彪元帅身边工作过的80余岁老人的良知，还原其叱咤风云、常胜疆场的英雄本色。回顾本书编著成卷的艰难历程，我激情满怀、感慨万千，那令人难以忘却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从1959年12月到1964年10月在林彪身边任秘书。九一三事件后，原林办的工作人员，全都以最快速度被集中到北京西山的亚洲疗养院。这里是中央专案组的办公地点，

也是关押与林彪一案“有关”人员的临时监狱。防火墙内戒备森严，警卫林立，如临大敌。九一三事件之前，我已遭不公正待遇贬职下放到青藏线某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几日，我奉召从风雪高原上的青海格尔木，日夜兼程被“护送”到北京，事先毫不知情。到了这里后，当即由总政治部保卫部长单独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我只听他传达了文件的标题，脑子轰然一声，就什么也听不见了。这位部长读完文件后又说了一大段话，我懵然不知，呆若木鸡。他看我毫无反应，稍等了几许。这时我似若醒悟过来，慢慢地说：我刚才什么都没听清，能不能让我自己看一看文件，他同意了。林彪事件对我的震动之大，可以想见。

直接负责亚疗专案组的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中国公安部部长李震（一年后突然自杀）、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等，他们要求我们这些被关押的人毫无保留地揭发林彪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帮助党中央查清林彪一伙叛党、叛国的阴谋。

然而，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认真、反复回顾在前毛家湾八号工作的前前后后、日日夜夜，……。那时，几乎每天我都要见林彪一两次面，加之我还兼管着林彪读书学习方面的事务，这样一来与其见面的时间就更多一些。开始是关光烈秘书和我，1961年又添了一位周衍盛，我们三个都怀着崇敬的心情做着林彪交付的工作，丝毫没有察觉到有任何可疑的言行作为。给我的直觉他是一位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领袖人物（我曾在《林彪读书见闻》一文中，披露其与叶群1960年1月至11月的学习情况），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叛党、叛国的头目？

当时，我无从揭发，只有尽力把在林彪办公室时所做的工作，无论大事小事，一律事无巨细地一一加以罗列，作为揭发材料上交。好在我已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调离了林办，所以专案组对我并不十分苛刻和严厉，没有更多地难为我，只要求我老实地等待组织上的结论。大约一年左右，我们搬到了公安部所属的北京市团河劳改农场，改称为中央组织部办的“读书班”，边揭发边批判、边学习理论、边劳动改造，又延续三年。

在团河农场的三年间，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党内的路线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在短短的50年（1921年至1971年）内竟有十次之多，而且又如此的复杂和尖锐？而每一次路线斗争无疑都要整倒一些领导人，伤害一批干部，殃及一部分群众。甚至血泪横流、骨肉分离，怨声四起！

特别令人痛心的是路线斗争的衍生物。九一三事件之后，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怪事、错事、坏事一古脑儿往林彪名下挂，而使那些真正应受到历史责罚的人置身事外。随之一些丑化、歪曲、妖魔化林彪的言论评接踵而至，把一桩极为严肃的政治事件庸俗化了，这正是某些人所希望的。

作为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首脑人物林彪，既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又被捧上毛的“接班人”位置。然而仅仅时隔两年，却突然从青云直落地狱，横尸温都尔汗，好人耶？坏人耶？我想弄个究竟，于是萌发了全面、系统研究林彪生平活动，进而编著《林彪日记》的初衷。

1988年，我离职休养后开始搜集、阅读、整理有关纪实林彪生平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开展工作十分艰难，借阅资料往往遭到婉拒，专访知情人亦相当费力。不仅如此，还得冒着风险、顶着压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各样不测的发生。

幸运的是，期间得到知名作家舒云的倾力协助（她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林彪画传》等著作畅销海内外），由于在如何认识林彪、如何结合中国革命史研究林彪的问题上，我们有着许多共识，商定共同编著出版本书。

《林彪日记》编著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史学工程，涉及问题众多。林彪元帅的一生，囊括了整个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要真正全面、系统反映林彪元帅的生涯，客观公正地展示这位叱咤风云、常胜疆场的英雄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经历、命运遭遇、个性风采和胆略智慧，并非易事。尤其是编著在历史上带有争议的林彪事迹更是如此。因此，我期望《林彪日记》能为研究林彪军事思想、军事实践和其历史作用，开启一扇扩大视野的窗户。

显然，林彪元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不可能通过《林彪日记》就可论定。但我深信《林彪日记》能再一次向世人表明：林彪的一生，无疑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以及文革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通过本书，读者可以全面、系统地看到林彪元帅在长期军旅生涯中，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大智大勇、慎思断行，具有非凡的军事胆略和军事才能，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时至今日林彪元帅仍是一位未被史家论定的历史人物，但我坚信林彪是一个最经得起研究的人。历史的误会，随着时光的推移终归会澄清的。但愿《林彪日记》的问世，能为世人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的林彪，揭开蒙在林彪元帅身上的迷雾。自然，我们相信书中一定会存在着疏漏甚至错误，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中许多有关林彪生平活动的资料和信息，来自于众多同仁的提供、支持和关心，本书的编著出版同样也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倾注了他们大量的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 原载《林彪日记》 明镜出版社 2009年9月版

~~~~~

【文革一页】

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

• 丁龙嘉 •

◇ 毛泽东关注的“青岛事件”

“文革”初期，青岛市出现了中共党组织按照刘少奇的规则 and 传统做法领导运动和部分青年学生按照毛泽东的指引开展运动的现象，以及二者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其间，发生了三次激烈的交锋，而在第二次交锋中出现的“青岛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1966年6月中旬，中共青岛市委成立了以第一书记张敬焄为组长的“文革”领导小组，确定了开展运动的步骤，又召开了6万人的动员大会，号召将“文革”进行到底。

然而，全市的运动并非都按照市委的部署进行。6月1日毛泽东指示向全国、全世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把矛头指向学校党委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张大字报，同时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起草的署名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6月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掌控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此时，青岛市的医学院、海洋学院、化工学院三大院校及部分中等学校的学生，迅速掀起了揪批本单位的“重点人物”、“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高潮。其中，有的批判了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有的自发成立了组织。这时，发生了青岛木器一厂部分职工拿出武装部的枪支保卫大字报的事件。

青岛市委为了控制局势，效仿中央向北京大学等单位派工作组的做法，从6月19日开始向青岛医学院等大专院校、青岛市第二中学等中等学校、《青岛日报》社等文化单位以及青岛木器一厂等单位派出了92个工作组或观察组，并要求工作组按照刘少奇制定的《中央八条》和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转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开展工作。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后，取缔了学生、群众中自发成立的各种组织，批斗了带头起来造反、批判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人，当时称为“反击”。

这期间的6月25日，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诱发了后来震惊全国的“青岛事件”的事情。当天，正在青岛市立医院实习的青岛医学院部分学生，给院党委和第七病房贴出大字报。部分医院职工认为大字报与事实不符，就与学生展开了辩论。经过当时主持医院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张秀文做双方面的工作，使辩论暂时平息下来，但并未解决矛盾。

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的指示，决定撤销各学校工作组。8月4日，青岛市委决定撤销派出的所有工作组。这一时间青岛市委与起来造反的学生、群众的斗争，被称为第一次交锋。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文革”的《十六条》，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式确立了“文革”的“左”倾指导方针。全会之后，青岛市的党政当局和起来造反的学生，都以极快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开展运动。8月20日，青岛市委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8月23日，各学校刚刚成立的红卫兵，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好得很》的社论的鼓动下，仿效北京的红卫兵，杀向社会，疯狂地破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城里赶走所谓的“牛鬼蛇神”。

8月中旬，青岛医学院的部分师生散发了《给全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市委有很多严重的问题，要想把本单位的革命搞到底，必须首先搞清市委的问题。”还有部分学生贴出大字报，认为市委“怕”字当头，使“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在前段时间受到学校当局和工作组批判和处理的部分学生到市委追查后台。这样，几部分学生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市委。由于《十六条》明确提出学生的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中央又明文规定“不要限制学生”，所以，市委虽然受到了威胁，却显得束手无策。

8月24日，青岛医学院的部分医生和教职工，针对他们认为是青岛市委几年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在“文革”中压制群众、包庇镇压群众运动的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张秀文等问题，贴出了几十张大字报；另有100多名学生到市立医院贴出大字报，要求澄清“六二五”事情的真相。当晚，这些学生又联合海洋学院、化工学院等学校的400多名学生到市委，要求撤销张秀文的一切职务，并静坐示威，施加压力。市委常委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张秀文的一切职务。这实际是丢卒保帅。然而，抛出一个卒子就能保全自己吗？！学生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到市立医院，在没有找到张秀文的情况下，武斗了9名医务人员。

8月25日，这些学生揪斗了张秀文，同时，散发了《坚决造青岛市委的反》的传单。消息很快传遍开来。张秀文的被撤职和被揪斗，引起了医务界和社会上部分干部和群众的不满，青岛市开始出现了以三大院校为代表的学生、红卫兵与部分干部、群众的对立。

当天上午，社会上流传着三大院校的学生要在晚上召开万人大会，砸烂市委的消息。这个消息，是实情还是谣言，来自何处，至今还是个谜。下午，市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据副市长王效禹后来说，张敬焘在会议中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是什么？”

会议认为问题出在《十六条》没有深入人心上，决定当晚在全市掀起一个学习、宣传《十六条》的高潮，并分别向全市各大系统部署立即上街开展宣传活动。这一决定，打的旗号是学习、宣传《十六条》，实际是要粉碎传说中的学生召开万人大会和砸烂市委的行动。这必然会激化双方的矛盾。今天看来，确非明智之举。晚间，数万名干部、工人、市民与三大院校上街的学生相遇，还有部分干部、工人、市民包围青岛医学院，双方展开激烈辩论并发生局部的肢体冲突。对立情绪严重升级。

8月26日凌晨，张敬焘出面接见了学生，回答了学生提出的为什么要上街宣传《十六条》和有关市立医院的质问，同时，表示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又要求学生按《十六条》办事。张敬焘的接见，表明他已经看到了这种混乱情况的危险性。当天，市委发出四条指示，要求工农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不准斗学生；干部、工人一律不参加学生的活动；所有机关干部去说服工人、市民撤出医学院周围地区；大型的宣传《十六条》的活动一律停下来。经过干部的劝解工作，到28日，宣传《十六条》的活动基本停止了。但是为时已晚，在宣传《十六条》的活动中陷于孤立的学生，已于26日向全国各高校发出了“紧急呼吁”，诉说“遭到了武装警察和工人、群众的围攻”，有“140名师生被打伤”。“紧急呼吁”发出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20多所外地大学的1000多名师生赶到青岛进行支援。事态扩大了。

8月27日，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赶到青岛，了解情况，之后向中央作了汇报。29日，青岛三大院校及外地到青岛支持的学生召开了“革命造反誓师大会”。会上，给张敬焘戴上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革命分子”的木牌和大纸帽子，进行罚跪批斗，同时宣读了中共山东省委责令张敬焘向三大院校师生做检查、听取批评的电报。30日，谭启龙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率领工作组到青岛解决问题。当日，部分学生再次揪斗了张敬焘。学生野蛮揪斗张敬焘，无疑刺激了部分干部、工人、市民的对立情绪。

8月31日晚，谭启龙在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大会上宣布：省委已请示中央批准，撤销张敬焘的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这时，正有部分干部、工人、市民聚集在市委门前，要求省委工作组澄清“八二五”事件真相，确保张敬焘人身安全。消息传来，立即引起了这些人不满情绪的爆炸。他们成立了服务小组，召开了大会，并向中共中央发去了要求“做出正确决定”的急电。9月1日凌晨3时，谭启龙到市委门前传达了刚刚收到的中央指示：“青岛市发生的问题，由全市工农兵学等各界群众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张敬焘同志的错误问题，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指示传达后，大会作出了恢复张敬焘职务、严惩右派学生的“六项决议”。

9月1日上午，青岛全市流传着“中央决定恢复张敬焘市委第一书记”的谣言和传单，而且《青岛日报》竟为这一假消息出了“号外”。

谣言满天飞后，各单位纷纷到市委给张敬焘送慰问信，形成了“自发庆祝游行”，游行的规模，有10万至40万人的各种说法不等。这中间，部分干部、工人、市民冲进青岛医学院，高呼“抓右派学生”等口号，形成围攻之势。更有甚者，青岛市北区的法院和检察院勒令师生在24小时内投案自首，“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9月1日当晚，青岛市委召开全市各界群众和高校师生有线广播大会，谭启龙就青岛的形势和张敬焘没有恢复第一书记职务等问题讲了话，实际上是辟谣。但是，部分人不满意，拒绝离开会场，又形成了有4万多人参加的静坐大会。静坐大会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出了三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中央撤销山东省委对张敬焘的处分决定。2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复电称：“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青岛的问题，待研究后一定给你们作答复。”此时，青岛静坐大会又作出了一个与前一个“六项决议”相类似的“六项决议”。9月4日，中央正式作出了对青岛问题

的处理意见，中心内容是，中央委托谭启龙妥善解决问题；工人和学生要团结一致。谭启龙随即提出了分两步走解决青岛问题，首先解决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然后解决市委领导班子的问题。

青岛市9月1日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称为“青岛事件”。引发9月1日“自发庆祝游行”的是一则谣言。这则谣言来自何处？《青岛日报》为什么敢为谣言印“号外”？时至今日仍是个谜。有些人把庆祝游行说成是“自发”的，显然站不住脚。参加游行的人数达10万至40万之多，占青岛市100万人口中除去老人、小孩之外的近半数或超半数，如此大的规模，没有人组织是不可信的。况且，游行队伍井然有序，向中央施加压力的目的十分明确，这不是“自发”所能做到的。至于谁是组织者，尽管此后造反派进行了追究，但始终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不过，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判断标准，那就是庆祝游行对谁有利。显然，对以张敬焄为代表的群体有利。所以，有人认为各级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该是有道理的。说“自发”的人。一方面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另一方面是为了宣传张敬焄深得民心，撤销张敬焄的职务是错误的。

9月7日，毛泽东对“青岛事件”作出批示，批示是写在青岛市副市长，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书记、副团长王效禹9月4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上。这个报告是反对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示如下：“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您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笔者保留的当年社会上流传的毛泽东的批示，与上述有一处不同，即在“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后面还有一句话“都是错误的”。

9月11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的批示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出四条具体规定。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但令人不解的是，谭启龙当时没有在青岛传达毛泽东的上述批示。是中央不允许传达？还是为了限制王效禹的影响？

谭启龙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协商解决青岛问题的指示，于9月20日召开了由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大中学校师生、干部等各方面代表1174人参加的协商会议。因为各方代表分歧意见甚大，会场秩序混乱，最后不得不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谭启龙的讲话和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以为回应。在会议期间，将持有不同意见的师生驱出了会场。协商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当然也不可能解决问题。不过，“青岛事件”是暂时平息下去了。9月24日，谭启龙返回了济南。

谭启龙在近一个月中三下青岛处理青岛问题，虽然解决了大规模围攻师生的问题，但对化解矛盾收效甚微。在“青岛事件”前后，有近千名师生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9月1日之后的半个月，许多人感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只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9月7日的公开支持，造反的师生才摆脱了困境，占据了上风。“青岛事件”中，市委及部分干部、工人、市民与造反师生、群众的斗争，被称为第二次交锋。

“文革”初期发生的“青岛事件”，表面上聚焦了以学生为代表的造反派与以党政领导机关

干部为核心的当权派的矛盾和斗争，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与党政体制内抵制“文革”的力量的矛盾和斗争。

“青岛事件”，极大降低了全市党政领导机关的公信力，严重挫伤了以党政领导机关为代表的主流力量。此后，市委、市政府难以切实履行职责，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一步步丧失了执政能力，逐渐陷入半瘫痪境地。所以，谭启龙说：“山东的‘文革’也可以说就是从这次事件开始的。”

◇ 毛泽东重视的王效禹“造反”

当青岛的少数的造反师生与庞大的党政机关及其领导的群众尖锐对立时，一个领导干部从后者的营垒中杀了出来，站到了造反师生一边，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就是王效禹。王效禹的“造反”，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王效禹，1914年生，山东省益都县（今青州市）人。其母是老共产党员，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效禹在母亲影响下，积极投入抗日工作，于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中共村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中共益都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渤海区委干部科科长，中共临淄县委书记，八路军清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团政治委员，中共博兴县委书记，八路军清河军分区第十四团政治委员，中共清河地委副书记、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检查处处长，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1958年在整风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党内处分，降职到山东德州国棉一厂担任副厂长。1964年获平反，1965年6月起任青岛市副市长。

“青岛事件”发生时，王效禹正在青岛市的崂山县，担任中共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书记、副团长，兼崂山县中小学教师训练班党委书记。

“八二五”事件发生后，青岛市第四十一中的部分教师写出呼吁书，要求革命、造反、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王效禹当即给以大力支持，并于8月31日上午在崂山县中小学教师会议上宣读了呼吁书，又于当天晚上在崂山县中学“文革”小组长会议上表态支持。王效禹指出：要敢于大胆怀疑，敢于丢掉“怕”字，敢于革命；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南是保皇派，青岛市委有问题，山东省委有修正主义。王效禹表示，坚决支持四十一中革命教师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三大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成立红卫兵。王效禹的行为，被许多干部认为是造青岛市委的反，与市委决裂，不可容忍。

“九一”事件发生后，据王效禹说，“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南将他禁闭起来。周化南时任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而张敬焘后来说，不是禁闭，是看护。“当学生起来造反时，机关干部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有少数人响应，内外结合。当时的青岛市副市长兼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就公开表示支持学生造反。‘八二五’事件后，当他看到市委受到冲击，我被揪斗时，便在崂山县的教师训练班上发誓表态，与市委决裂，坚决和学生一起造反，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他起来造反。正在这时，发生了9月1日20几万人上街游行和静坐，要求中央撤销对我撤销职务的决定。这时王效禹吓得魂不附体，骂自己是老右派，不是人，要求戴高帽子游街，疯颠颠地一会儿道歉一会儿哭。周化南看他精神不正常，怕出事，就找项锡洲（当时是市委组织部党员管理科科长、崂山县委副书记）等四个人把他看护起来，在崂山县人委后面找了一间房子让他休息。”“9月3日，当他得知中央没有恢复我的职务时，在一个礼拜天，又趁人不注意跑到邮局向中央文革发电报，告了市委的状，说市委组织工农镇压学生，他支持学生造反被‘关押’。”谭启龙当时使用了“看管”两个字。不管是“禁闭”，还是“看护”，或

是“看管”，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限制了王效禹的人身自由，对党内的高级干部，不经过司法程序，就限制人身自由，可见当时中国的法制观点、法制建设是何等的薄弱。至于说王效禹“精神不正常”，那为什么不送精神病院？后来的事实表明王效禹精神很正常。

9月3日晨5时35分，王效禹给“四清”工作团写了一封信，通过看管人员黄兆顺递了出去。信的内容是：（一）质问：为什么对我采取这种措施？谁决定的？谁批准的？（二）要求：和全县机关干部见面，和全县教职员工见面，和全县贫下中农社员见面，和家属见面。接着，王效禹给中共中央发去了一封电报，内容是：中央：崂山县9月1日发生了严重的镇压革命的反革命事件。王效禹发于禁闭室。

9月4日凌晨2时，王效禹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拟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青岛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自青岛事件以来，犯有逃跑主义的错误和严重的方向性错误，稍微一紧张就藏起来，不敢和群众见面。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多方阻挠，在农村提出的口号是‘热情欢迎，坚决支持，婉言谢绝’，并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要他们在游泳中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他们不要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我提出过不同意见，做过争论，没解决问题。我在干部当中揭发这些错误，准备开始斗争，他们就把我关起来了，说我搞反革命暴动，组织大会斗争我。我不管几万人大会斗争，也要誓死批判这些错误，因为如不及早制止，将有发生流血的可能。望速处理。青岛的问题，我认为学生批判张敬焄同志的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的；当然打人是错误的，应该进行正面教育。组织工人、农民支持张敬焄同志，这是方向的错误，是违背中央精神和《十六条》的，势必要把这事情搞得更为复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发于禁闭室，九月四日二时。”09月4日是个星期天，白天，王效禹趁着看管人员不注意时通过邮局把电报发了出去。毛泽东9月7日的批示就是写在这份报告上的。笔者核对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125页中摘录王效禹报告的部分内容，是一致的。

9月4日晚8时，王效禹获得了自由。9月13日，王效禹给谭启龙写了一封信。也许王效禹此时还不知道毛泽东的批示。信中阐述了处理青岛问题的几点建议，一是要充分肯定、坚决支持三大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二是要相信革命师生的绝大多数是听毛泽东的话，不能对革命师生采取对立态度和压制手段；三是要说服群众，首先要说服干部，因为许多错话出自干部之口，许多错事出自干部之手，“九一”事件是干部带的头。信中特别指出：“‘九一’事件是个反动事件。”

9月25日，青岛市首批2700多名红卫兵乘专列赴北京，一是参加国庆18周年活动，二是参观、学习首都“文革”运动。王效禹写了三封信由青岛医学院红卫兵负责人张汉祥代送康生、王力、关锋。康生和王力、关锋接见了张汉祥等人。王力、关锋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革命战争年代，都在渤海解放区工作过，同王效禹熟悉。

王效禹致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王效禹在电报中阐述的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这在那个个人迷信盛行的时代，影响是相当大的。应该说，这是王效禹所始料未及的。那么，王效禹的“造反”为什么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呢？就王效禹方面来说，有三点原因。第一，王效禹一直信仰毛泽东的群众运动的理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指导减租减息运动，9月13日，他在致谭启龙的信中又提出要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立场去解决对革命师生队伍不纯的认识问题；第二，王效禹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第三，由于上述两点，使他能够比较深刻地理解《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中蕴含的毛泽东的意图。就毛泽东方面来说，他所发动的“文革”在运动初期遇到了来自干部队伍中的较大阻力，当时有很不理解、很不认

真、很不得力之说，像王效禹这样支持“文革”的，是凤毛麟角，所以，他批示说：“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10月初，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进一步扫除“文革”的阻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害是反群众路线，表现为挑动群众斗群众，支一派压一派。山东省出席会议的是谭启龙、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白如冰、省委书记处书记苏毅然。另外，中央指定王效禹出席会议。这显然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但遇到了谭启龙的反对。中央没有采纳谭启龙的意见，王效禹出席了8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王效禹的数次发言都遭到了谭启龙的乱插话和乱打断。中央“破格”点名王效禹出席工作会议，无疑是为青岛市、山东省乃至全国的造反派树立起一面旗帜。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青岛市形成了以中学生为主体的保市委和以三大院校造反派为主体的反市委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保市委派得到了市委和各机关干部的支持。双方矛盾愈来愈尖锐，斗争愈来愈激烈，甚至发生了武斗。这期间的斗争，被称为第三次交锋。此时的青岛市委，从半瘫痪状态进一步陷入了瘫痪状态。

◇ 毛泽东批准的“青岛夺权”

进入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成员姚文元奉命与上海造反派策划夺权。1月6日，上海市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宣布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发去贺电。16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同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指出，毛泽东“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这样，毛泽东将上海的“一月夺权”树为全国的范例。“文革”进入了夺权的新阶段。

为了保障全面夺权的顺利实现，毛泽东批准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公安六条》，旨在保卫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夺权。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决定了军队的支持是夺权能否成功的关键。

在张春桥、姚文元同上海造反派策划夺权之时，中央文革小组通过电话要求王效禹领导夺青岛市的党政大权。“青岛夺权”，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1月6日，王效禹伙同一部分人向全市散发了《致青岛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的一封信》，鼓动各造反组织成立联合机构，接管青岛市委“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切工作。同日，他还以个人名义发出《给全市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的一封信》，鼓动造反派联合起来，造省、市委的反。在策划夺权的过程中，王效禹与三大院校部分造反派师生产生了分歧。王效禹主张以工人造反组织为主联合学生造反组织夺权，后者主张以学生造反组织为主联合工人造反组织夺权。分歧导致了分裂，使原本筹划的1月中旬全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出现了各自为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王效禹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派张子石等人赴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夺权的筹备情况。张子石是康生之子，在青岛市教育局工作。康生、王力、关锋均表示：以王效禹为核心，夺取青岛市的权。他们指示说：“支持你们夺权。青岛有利条件，一是经过三次反复，革

命左派得到了锻炼；二是有个王效禹。”“不但要考虑青岛市夺权的问题。还要考虑山东省夺权的问题。”这显然不是康生等有权决定的大问题。二是组织造反派，于1月11日夺取了《青岛日报》社和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权，于1月13日夺了青岛市公安局的权。从而控制了舆论阵地和专政机关。三是策划轻工系统29个工厂企业的造反组织夺了青岛市轻工局的权，为全市夺权进行了一次预演。在三箭齐发皆中的形势下，王效禹于1月18日在《青岛日报》上发表了《坚决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一文。青岛夺权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1月22日，青岛东方红、全国革命造反红卫兵联络总部青岛轻工分部等23个造反组织召开大会，宣布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取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大权。大会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宣读了《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第一号通令》。《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着重阐述了夺权的理由，目的是表明夺权的合法性。《第一号通令》规定：封闭青岛市委、市政府，停止其一切活动；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委员会。同时号召夺取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大权。当时，王效禹发表了《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的声明。《声明》中说，“坚决支持和拥护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取了青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从今天起，辞去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的职务，愿意在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领导下，当好普通一兵。”这份《声明》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一是凝聚了大部分造反派及中间派的力量，孤立了小部分分裂出去的造反派；二是分裂了保守派队伍；三是吸引了部分干部的支持。

尽管王效禹发表声明支持夺权，但他对夺取的权力能否保得住并不自信。夺权的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央文革小组，称权是夺过来了，目前看还有被夺回去的可能。建议中央尽快表态支持。

青岛市的新造反政权，确实遇到了挑战。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分裂出去的造反派，一个方面是保守派，但反对派的力量并不强大。一度出现的围攻《青岛日报》社和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抗争，没有掀起大的波澜。

1月27日，关锋电话告知王效禹，中央已承认青岛的“一·二二夺权”。这时，毛泽东批准了青岛市的夺权，林彪直接指示驻青岛部队要支持青岛市的夺权，周恩来表扬了青岛市的夺权。

得到中共中央肯定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于1月29日举行了“抓革命，促生产，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誓师大会”。王效禹在大会上讲话，强调“这个权夺得好，夺得对”，提出“防止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要求造反派“以团结为重”，指出“既然权力我们能够夺过来，我们必然把它管好，相信我们也一定能够把它管好”。驻青岛的陆军某部负责人和海军北海舰队负责人分别讲话，表示“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革命行动，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一些造反组织的代表也讲话表示支持联合夺权。大会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第二号通令》、《第三号通令》。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发出了《第一号紧急通告》，要求只准文斗，不许武斗；各个革命组织都应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把挑动武斗和制造分裂的幕后策划者揪出来，依法严厉惩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号紧急通告》表明，这个造反政权要以强力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也就是维护自己的稳定。

1月29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青岛夺权的消息。1月30日，《人民日报》针对青岛夺权发表了《关键在于大联合》的社论。社论赞扬青岛夺权“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指出青岛夺权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号召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实现最广泛最紧密的大联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青岛夺权消息播出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全市造反派组织，特别是驻青岛的解放

军部队，立即走上街头，举行庆祝游行，欢庆夺权的胜利。1月30日出版的《青岛日报》，发表了王效禹1月22日的《声明》和空军战斗英雄舒积成的文章《百分之百地支持革命造反派》，以示革命干部与人民解放军对夺权的支持。自此，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后改为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取得了合法地位。

“青岛夺权”，为什么比较顺利且取得成功，笔者认为有以下六条原因。（一）造反派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强有力的支持。事实表明，造反派从“青岛事件”到“青岛夺权”，都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支持。现在一些著作和文章说是造反派仅仅得到了康生的支持，是不全面的。（二）造反派经受了斗争的磨炼。事实表明，造反派经过半年中的三次交锋斗争，经受了风雨，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本领。（三）王效禹发挥了核心作用。事实表明，因为王效禹反对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观点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王力、关锋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有着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所以他能够发挥也确实发挥了核心作用。（四）反对派力量较弱。事实表明，保守派在半年中的三次交锋斗争中，连续遭到打击；分裂出去的造反派的力量和影响力都不大，而两者又不可能联合起来，所以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对抗力量。（五）夺权采用了闪电战术。事实表明，夺权前后的每个步骤都相当紧凑，夺权之后王效禹即建议中共中央尽快表态支持。从宣布夺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夺权消息，仅仅7天时间，这就使反对派没有时间形成抗衡力量。这被王效禹后来称之为闪电战术。应该承认，因为王效禹在革命战争时期长期担任军队领导人，所以有着比较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他把军事斗争中的闪电战术用在了夺权上。此后他在夺取山东省党政大权时依然采取了闪电战术，不过就没有这么奏效了。（六）军队的大力支持。事实表明，军队尽管是在夺权之后奉命支持的，但其威慑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967年1月31日，遵照中央的指示，王效禹率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南代表团到达省会济南，展开了又一场夺权斗争。

□ 《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

【名人后事】

陈伯达后事处理始末

• 王文耀 • 王保春 •

◇ 陈伯达突然去世

1989年9月20日，是一个阴雨天。忙了一天的王保春拖着疲惫的身子下班回家，到家休息了片刻，刚拿起碗吃饭，突然电话铃响了，他放下碗去接电话，听对方说完，他放下电话自语道：“怎么会呢？”老伴忙问怎么回事，他说了几句。老伴说：“那你和文耀快去看看吧！”

王文耀也正在吃饭。保春一进门就急匆匆地说：“告诉你，陈老头去世了……”文耀一怔，忙问是何时去世的。保春说：“是公安局的老萧刚来电话说的。不巧的是晓农今天上午去石家庄看他母亲去了，只有兰华在家。怎么这样突然，上个星期咱们去看他时，他身体、精神还挺好的。你快吃饭，完了咱们去一下。”文耀说：“不吃了，咱们走吧。”

我们俩一路紧着骑车，7时半到了陈的住处，见到了陈的儿媳妇兰华和孩子。兰华把孩子支到另一屋子，哭着述说了老人去世的情况。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头天晚上落了秋雨，早上很冷。晓农走前，去陈屋里看过几次，想告别一下，可每次见陈睡得好好的，不忍叫醒他，便把刚找出的毛裤放在陈的床前椅子上，就出门走了。陈起床后即连声说冷，一边问：晓农走了吗？兰华说：他走了，他去您屋里几次，见您睡着，就没叫醒您。中午吃饭时，陈在过厅吃，兰华和孩子在有电视的屋里吃，忽听到过厅传出盘子和碗的碰撞声，接着咚的一声，兰华赶紧过去，只见陈坐在椅子上，头歪在墙壁上，嘴里吐出食物，脸和嘴唇都发紫。兰华扶起陈的头，大声喊他，同时让孩子叫对门老萧。老萧过来给老人嘴里塞了救心丸，又赶紧找社区卫生站的大夫，打电话找朝阳医院的大夫，并通知了陈现在的单位北京市文史馆，随后又打长途电话给石家庄的晓农。

卫生站的大夫来后，看老人还有微弱的脉搏，正准备打葡萄糖针，朝阳医院的陈大夫和徐大夫赶来了。陈大夫给老人量血压，已经没有血压了，再翻开眼皮一看，瞳孔已经放大。陈大夫说没有救了，准备后事吧。

兰华说，她当时失声痛哭，不知所措，在场的朝阳医院的党委书记、公安局的萧键同志、住地派出所所长等人，共同商量决定，先将老人送到朝阳医院太平间，待晓农回来商量办后事。随后大家冒着淅淅沥沥的雨水，将陈的遗体抬下楼，送上了车。

我们听了兰华的讲述之后，又去住在对门的公安局萧键同志家中，听他说了抢救陈的过程（他和兰华讲述相同）。当天晚上8点15分，我们离开了陈宅。

◇ 将陈伯达去世情况告知领导同志

因当初是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代表中央让我们与陈伯达联系的，现在陈已经去世了，我们认为应及时告诉有关领导，因此我俩蹬车直奔领导同志家。

到了这位领导同志的家，已是晚上9点钟了，他正在看电视，见我们这样晚了来，有些诧异。当我们将陈去世的事告诉他后，他半晌没说话。待了片刻，他慢声地问我们：陈伯达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们答：85岁了。

他说：他什么时间出的院？

我们说：今年春天出的医院。

他说：从84年我不与你们联系之后，他还写了些东西吧？

我们说：可能写了些东西，都不是经过我们的手，而是从公安局那边送过几篇，不知写了些什么。

他转了话题说：告诉晓农，处理后事，不要提什么要求，应听从组织上的安排。骨灰看放在惠安（陈的家乡是福建惠安）还是什么地方？家属可斟酌一下。家属都应通知到。刘叔宴和他正式离婚了吧？刘生了两个孩子吧？

我们说：是陈伯达在刘叔宴提出离婚后自己写的离婚书，当时曾给杨得志同志看过，还给周总理看过，不知算不算数。刘生了女儿岭梅和儿子小弟。小弟在陈伯达倒台后，与保姆一起被关到卫戍区将近三年，受了惊吓，不敢再与陈联系。

领导同志还问到陈的经济状况。

我们说：陈刑满后的月生活费是250元。陈1958年以后的稿费，过去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58年以前的稿费除了买书用掉的，还有两万多。听晓农说，这些稿费85年已发还了。这些钱加累计的利息，分给了刘和陈及子女，但小弟没要，让给了晓农。晓农工资低，兰华为照顾陈，又留职停薪几年，经济较拮据，发还稿费就好过些，只是陈仍不改买书的习惯，不停地让晓农给他买书，用去一些钱。

领导同志还问道：陈伯达那里收集了些自己的著作没有？

我们说：没有几篇，他原来的书，连同他自己的著作，1971年抄家后一直没有发还。

领导同志说：他在延安时写的《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几本书，不知道他那里有没有？他的《论谭嗣同》对我的印象很深。

我们说：他一直想要这几本书，可是原有的书未发还，这几本书现在市场上又买不到，一般图书馆也不让借阅。我们只好从中央书记处政研室的图书馆给他借了几本，是批陈整风时编辑的，1974年印刷的，书名叫《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反动言论集》，是从全国各地收集的他在解放前的著作，大约编了20多个分册，是供大批判用的。我们借出了很少几册。陈看了目录以后很高兴。他说自己都收集不了这么全。

领导同志说：在延安写的怎么能说是反动言论？就是在白区写的也不能说成是反动言论呀！

谈了大约一小时，我们就离开了。

◇ 丧事的筹办

自从9月20日陈伯达去世后，天气一直很冷，阴雨不断。陈晓农说文史馆（陈伯达服刑期满以后，人事关系由公安局转到了北京市文史馆）告诉他要在国庆节前火化，决定9月28日在八宝山殡仪馆进行遗体告别，一切要从简，现场不挂横幅，用陈健相的名字举办，交通工具给提供一辆面包车。文史馆有一人兼管办理此事，可是晓农去找此人商量如何办理时，没有找到。时间很紧，晓农和他的妹妹不知如何操办。在此情况下，我们俩约晓农一起研究办理他父亲的丧事。

25日在保春家中，几个人按照文史馆向晓农交代的精神，商量决定：

- 1、口头通知过去在工作上接近过陈的几位同志，自愿参加；
- 2、准备一张遗像照片；
- 3、老人的外衣，可从旧衣中找件比较新一点的中山服；
- 4、送花圈、挽联的署名按文史馆的要求署陈年轻时用的名字陈健相。

大家商量之后，马上分头准备。

保春负责将陈的死讯通知住在附近的一些同志，告诉他们遗体告别的时间和集合地点。陈伯达平时不喜照像，旧的照片1971年抄家后没退还，新建的家里又无照片，晓农就到我们俩家里找，仍没找到一张能用的，只好让王文耀懂摄影的儿子王东升采取技术措施，从现有的合影照片上剪出一张加以放大。文耀和爱人郝志敏在求是杂志社技工班老工人贺万钧、曹永和的帮助下，拼配修理了个旧像框，随即赶到陈家帮晓农装好遗像，并帮他准备了其他事项，夜里10时许才返回家。

◇ 遗体告别

9月28日早上，最先来到八宝山的文耀、志敏和露菲打听到指定的告别室，是八宝山殡

仪馆西边旁门内，编号第一的告别室，面积约有一间教室大小。前边一位告别仪式正在举行，待他们举行完了之后，我们开始整理场地，这时北京市文史馆的人也来了。

陈的遗体由晓农一家和王东升护送到了之后，推到化妆室里排队。由于前边排队待化妆的遗体不少，中新社的耿军和冰心老人的外孙陈钢有些着急，就在那位化妆师的耳边小声的说了陈的名字，那位化妆师没有说话，马上提前认真细心给陈面部作了修饰，在修饰时由于枕头太低不好操作，在场的老干部姚黎民同志当即将自己身上穿的棉背心脱下，让垫在陈的头下。

遗体修饰完后，耿军和陈钢帮着晓农到院子里找了两块合适的砖头，垫到陈的枕头下，换下了姚老的棉背心。

陈穿着他过去常穿的驼色的旧中山服装，平躺在鲜花丛中，身上盖着白布单，四周摆放着他的二十多个生前好友送的花圈，还有北京市文史馆送的花圈，花圈的白色带子上都写着：“悼念陈健相先生”。刘叔宴因病没有来，她委托晓农专送一个花圈，让晓农写上“健相安息”四个字。晓农一家和岭梅送的花圈上写着：“亲爱的爸爸安息吧”。遗像上方的横幅位子空着，室外人望去不知是与何人告别。

告别室内气氛肃穆，人们都眼含泪水低声啜泣，当长年照顾老人的儿媳兰华节制不住，失声痛哭时，全场一片恸哭声。

白发苍苍的史立德同志和拄着拐杖赶来的张楠、王拓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缓慢地走在前面，向陈的遗体告别后，走到花圈跟前同陈的家属晓农、岭梅、兰华及陈的孙子握手表示慰问。洪禹、姚黎民、马关、史凤歧等几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露菲同志和我们俩，以及李景如、郝志敏等十来位曾接近过陈的同志，还有北京市文史馆的同志等，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位同志和朝阳医院的大夫，也都分别缓慢走过陈的遗体，向陈的家属表示慰问。

参加遗体告别的人中，有的我们过去并不认识。如走在最前面的史立德同志，他不知从何处听到消息，就自己来了，并在留名册上签了名。2000年他去世后，我们从当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吕正操同志悼念他的文章中才知，他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曾任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北平学联主席，抗日战争中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

洪禹同志原准备与爱人叶茵一起来，因叶茵病重，只能自己来。洪禹告诉晓农，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错当特务受审查时，是陈伯达向毛泽东转交了他的申诉信，并促毛亲自写了回信，才使他和一大批受审查的人都得到解脱的。毛泽东的这封回信已被收进《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洪禹郑重地代叶茵在留名册上签了名。洪禹同志1998年6月去世，同年7月31日的《中国改革报》刊有悼念他的文章。

还有三位远在外地的老同志，听到陈伯达的死讯，打来长途电话，托他们认识的同志代他们在留名册上签名，并给陈晓农发了唁电。

告别后，陈的遗体在他的儿女和原接近他的工作人员的护送下，缓缓地告别室送到火化炉旁，排队等待火化。

告别仪式结束后，我们和一位帮助办理此事的同志谈及陈伯达，他讲，医院大夫问他怎么看陈，他答道：“我认为陈有功有过，功、过分开，他还是做了不少事的。”说完他极小声地对我们耳语道：“大夫对我讲，陈老对毛主席、周总理和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呀！”

告别仪式中，姚黎民同志自带相机照了相，他流着泪把陈送至火化炉旁。他叹了口气对我们说：“就这样完了！他是中国的一个文化大名人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他参与起草的呀！今年是建国四十周年了，而他就这样走了。”

陈伯达去世之后，1989年9月29日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就进行了报道，不知他们的消息是从哪里得知的。

10月1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发了一条消息：“陈伯达因病去世。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本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十月刑满释放。”

几天后，陈晓农和张兰华在王东升陪同下，到殡仪馆领取了陈伯达的骨灰，将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附近普通老百姓存放骨灰的老山骨灰堂。因老山骨灰堂规定存放期不能超过三年，1991年陈晓农一家将陈伯达的骨灰带回了福建惠安老家。

□ 《世纪》 2009年第5期

~~~~~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三）

• 舒 云 •

20、毛泽东为什么不让拦截256三叉戟？

可以肯定，256三叉戟深入蒙古不是被劫机，不是入侵。但是，256三叉戟是自己掉下来的，还是被打下来的？有人怀疑是不是我们在边境打下来的，甚至越境打下来的。

空军副参谋长白云说：问题重大，我打电话叫参谋长梁璞来。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来电话，飞机跑了，是不是打下来？叫我们把所有的对空台都打开，呼叫返航。梁璞和吴法宪几次通话，还可以打，歼击师有值班飞机。吴法宪请示后说不准打。指挥所一直紧张，打不打？做好备降准备，好多事情做。刚有点闲，直升机又上去了，又开始紧张。命令打直升机，直升机速度低，打也困难。情况不明了，以后才清楚，林彪怎么在飞机上？吴法宪也不一定清楚林彪在飞机上。

吴法宪为什么提出要打？空军参谋长梁璞也提出来要打？

打？怎么打？空军指挥所作战参谋没有提出打。空军作战部值班参谋朱秉秀说：打要有准备的时间。飞机起飞不那么简单，根本来不及打。256三叉戟飞那么低，3000米，甚至3000米以下。讲打，真正落实打，技术上不能解决。赤峰机场不在引导范围，远航作战达不到。当时高空作战的夜航大队是歼五、歼六，没装备空空导弹。加上半径限制，也够不到，吴法宪弄不懂。对付直升机完全有手段，打三叉戟没有手段。朱秉秀断言，从技术角度看，当时没有条件打。打U2，都是2万米的高度。而三叉戟高度太低，导弹制导不了，无线电抓不住。而且三叉戟选择的航路沿途没有地空导弹部队。看样子，林立果仔细研究了航线，如何躲过地面导弹和空中歼击机的打击。三叉戟速度也不比歼击机慢，拦截也不可能。它自己建立的那条航线上，没部队，没机场，拦截不到。作为工作人员，只能摆出具体情况，供首长参考。李德生出出进进，就坐在我身边，也不需要作更多报告，指挥所里有红本子，直接对主席，也



可以找总理。李德生到指挥所，三叉戟已经起飞。三叉戟与直升机不一样，直升机当时报过来了。三叉戟起飞时，我们还糊涂，没有判断，怎么会出现这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情况不掌握。飞出国境，雷达消失，还怀疑是不是着陆温都尔汗？没判断摔，李德生拿电话向总理报告飞机消失，什么位置他没有判断。李德生在指挥所三天三夜。当时记录，我记了很多，来来往往，最后把我的记录本调走，这个本子现在哪里，我不知道，王洪文调走的。调我的本，也应该调标图，没见到公开，应该还在。

我多次采访过时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鲁珉。他说：绝对不是中国打的。当时中国只有空军装备从苏联进口的地空导弹，发射最远距离40公里，怎么可能打到深入蒙古境内300多公里的飞机？

吴德说：不是我们打的，我们没有打，蒙古方面也没有打。飞机出境后，我们的雷达很快丢了目标。飞机进到蒙古纵深，边界都看不见了，肯定不是我们打的。

256三叉戟开始向西，以后向东，最后突然向北。吴法宪一一报告给总理，256三叉戟飞到赤峰附近，1时12分，吴法宪打电话请示是否对飞机进行拦截。汪东兴请示毛泽东后，回吴法宪，不要派飞机阻拦。吴法宪说拦截是一种政治表态。专机叛逃，空军司令员的责任非同小可。管它能不能打，先表个政治态度。不是我不积极打，而是上边不让打。如果上边说打，我先组织力量，打得了打不了再说，是不是这样呢？吴法宪后来解释，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的意思，而是要截回来。周总理说这要请示毛主席，答复是让他去吧。飞机向西时，吴法宪要胡萍叫专机师用报话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喊了15分钟，没有回答。到凌晨1时，周恩来问飞机到什么地方了？吴法宪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100多公里，高度3000米。……1时55分，飞机飞越国境，雷达看不见了。

有关这些作战的情况毛泽东并不一定清楚。而吴法宪请求的是要不要拦截。但毛泽东坚决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

难道毛泽东胸有成竹？

难道256三叉戟被做了“手脚”？

至于蒙古打没打？我们并不清楚。就是蒙古没打，驻蒙古的苏联军队会不会发射地空导弹？说不清楚。因为中国的事调查专家应该到场，却没到现场，无法得出更准确的结论。苏联人不“坦白”，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和苏联人一样沉默。

21、256号三叉戟飞到北戴河上空了吗？

9月13日凌晨，北戴河林彪别墅的工作人员听到了飞机响声。这可能吗？北戴河在山海关机场的东北50公里，上空没有航线，34师师长时念堂说：三叉戟起飞后，再也没有返回山海关机场。飞机时速500公里，早超过了北戴河的范围。但是如果飞机建立起落航线，北戴河就能听见。9月12日晚上林立果乘三叉戟到北戴河，在外面乘凉的林办工作人员就听到了飞机落地的声音。256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先向西南，右转弯，对着北京方向，到迁安（这是飞行员潘景寅的老家）改向西北。

时任北戴河北京军区疗养院外科护士的杨桂兰回忆：1971年9月13日凌晨她起床给儿子换尿布，忽然听见房顶轰隆隆响，大得好像房顶上开过去拖拉机。杨桂兰是飞行员家属，她对飞机起飞并不陌生，但她说在北戴河半夜听见飞机声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她根本没

有当成是飞机声。北戴河北京军区疗养院和林彪别墅是邻居，住在林彪别墅附近的人听到256三叉戟起飞也是真实的。

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也清楚地听到了256三叉戟起飞的声音。李文普自伤后，被八三四一部队的卫生员简单包扎，经外科医生出身的张清霖检查，之后很快被八三四一部队的官兵押送到北戴河北京军区疗养院。咚咚咚砸开急诊室的门，值班的外科医生询问是枪伤，也没多问，直接进手术室清创。因为子弹没有留在体内，手术时间不长。而手术中间，手术室的人都听见了飞机起飞的巨大声音。外科医生正忙着，没有注意其他，而在旁边的护士发现病人李文普听见飞机声后明显一愣。

李文普的心理活动应该是这样的，奇怪！林彪飞机怎么起飞了？林彪飞机怎么能起飞呢？八三四一部队不是拦截不让走吗？林彪在飞机上吗？作为贴身警卫的他没有跟着林彪走，会对他怎么处理呢？反正枪走火，自己负伤进了医院，没法鞍前马后了。但会对他怎么处理，他心里没有底！

李文普的情绪沮丧极了，黑着脸，一句话不说。

八三四一部队派来看守李文普的官兵要求给李文普找一个单间病房，要大一点，因为八三四一部队的两个人，一个官，一个兵，24小时每时每刻要监视李文普，并要求无关的医护人员不能进来。住院的几天中，李文普在枪口下吃饭，在枪口下上厕所。我问过八三四一部队的负责人，最初是把李文普当作敌人了吗？回答不是，只是为了保护李文普的安全，不能让他死了。言外之意他再自杀怎么办？

几天后，连主管医生也没有通知，八三四一部队就悄悄把李文普带走了。护士整理房间时发现李文普床垫底下有几张写满字的纸，赶快交给领导。38年后，这些目击者只记得大概意思是枪走火。

李文普是走得匆忙，还是故意留下点什么把柄？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采访北戴河北京军区疗养院前，没有任何人找过接触李文普的医护人员谈话，问过这些事。只是看过李文普遗留纸片的几位医护人员被办了学习班，直到传达九一三事件后才被放回家，但要求他们对谁也不能说。

22、谁知道256三叉戟飞向哪里？

在空军指挥所、北京军区指挥所、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以及西郊机场调度室的人们都异口同声，三叉戟飞出去是一条直线。北京军区作战部参谋刘建林说：飞机从山海关起飞，一条特别直的直线，直奔蒙古。搞不清敌机我机，没说打，请空军重新再标一下，还是一条直线。一点弯都没有。空军指挥所作战值班参谋朱秉秀说：当时根本判断不出来，不知道林彪在飞机上。传达禁空令，只是感觉问题大了，直到9月28日李德生传达，才知道林彪在飞机上。256三叉戟从山海关往北飞，航向推测向国外，一根直线，直向乌兰巴托。空军雷达兵部部长傅英豪事后画航图，基本上是之字形，山海关、迁安、多伦、贝勒庙、伊德尔莫格、温都尔汗。

但是，谁也不知道256三叉戟飞向哪里。

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回忆：那时太紧张，没想到这局面，林立果和周宇驰要跑。9月12日下午说广州、重庆、东北，飞这三个点。林立果说，明天还要送大家去广州。我们开会到夜里

12时，会没开完就作废了，但还是到广州。半夜我的秘书孙水森说，调度室说林副主席要回来（北京），飞机起飞了。我看情况有点紧张，就去了指挥所。李德生先进去，我后进去，看飞机向西，拐大弯，向正北，很快就要出去，我去时还没转弯。我当时不知道林彪在飞机上，梁璞说，是刘沛丰、林立果他们。标图板是一块大荧光屏，墙上标图，桌上也标，高度、方向都一清二楚。航向很乱，过了遵化才发现目标。慢慢朝北飞，又向西，后来朝北，当时判断飞机可能出境。256三叉戟飞的不是国际航线，飞国际航线要转华北，通过二连浩特。梁璞好像非常奇怪，说很不正常。256三叉戟没在航线上，就像火车没在轨道上一样，当然异常。

李德生坐到荧光屏前5分钟后，目标就消失了。李德生来，王飞觉得很反常，全国的雷达全部开放，更从来没有过。很快256三叉戟过了国境，短程雷达只有一部跟踪出去。雷达掌握不连续，出境后高度下降，判断想找地方迫降。掉下去也知道，雷达再远也能看到。飞机没高度，就是掉下来。

王飞也没多想，更没想到逃跑。他认为这事与自己没有更多牵连，就回家睡觉。第二天，李德生在空军司令部找王飞谈话，有半个小时。怎么回事？这几天干什么了？王飞就哼哈，什么也没说，怕说错了。以后就没有谈。几十年后，王飞说，现在看李德生有准备，但当时很随便。

王飞回忆：9月14日中午我看到中央文件，紧急战备？雁门关、长城以北、嘉峪关，三北部队要提高警惕。不就是林立果跑到广州去了吗？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晚上李德生开会，说空军出了问题，空军应该组织起来，找几个人负责，曹里怀、梁璞、王辉球、白云……我当时想，我一定有牵连，知道要糟糕。开完会不到12时，我在司令部看文件电报，12时多回家。正要洗澡，副司令员曹里怀打电话叫我到办公室。我去了指挥所，曹里怀把李德生的一个纸条给我：“王飞同志，请到我处谈一谈。”曹里怀说李主任找你谈，好好谈谈，没什么事，谈清楚就行了。我出来上汽车，从此失去自由。

王飞被抓后，说十五贯，娄阿鼠。

纪登奎听娄阿鼠这个名字陌生，急忙说娄阿鼠是谁，快把他带来，不能让他跑了。

90年代我采访王飞时，说起这事他还在笑。

《十五贯》是昆曲代表作之一，在昆曲中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原剧由清朝朱素臣所著，后由陈静执笔，据此和小说《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改编，浙江昆苏剧团1956年首演。

内容是无锡县肉铺老板尤葫芦借十五贯本钱作生意，他对女儿苏戍娟开玩笑说这是卖她的钱，女儿信以为真，连夜逃走。赌徒娄阿鼠闯进尤家，为还赌债盗走十五贯钱并杀死尤葫芦，过后反诬苏戍娟谋财杀父。苏戍娟与不相识的客商伙计熊友兰同行，而熊友兰正好带钱十五贯，于是被邻居扭送县衙。知县过于执听信诬告，定苏戍娟勾结熊友兰盗钱杀父，判苏、熊二人死刑。监斩官况钟觉得内中有冤，力争缓斩。他乔装算命先生，套出娄阿鼠杀人的口供，杀人者伏法，蒙冤者昭雪。

《十五贯》强调了况钟注重调查研究、重事实、重证据、秉公执法的作风，深刻揭露了封建吏治的黑暗腐朽，发人深省。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称赞它是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良好榜样。同年，昆曲《十五贯》摄制成彩色戏曲艺术影片，被诸多剧种移植，在民间流传很广。

可惜办理九一三案子的纪登奎没看过。

1980年审理“两案”，要不是因为王飞的“精神病”，他就成了主犯。

直到现在王飞仍是保外就医，没判，但一直是犯人身份。

除了“娄阿鼠”，王飞脑子里还响着一句话：赵树理说公鸡会下蛋，我就说亲眼见。

23、256三叉戟上四位飞行员怎么能算病故？

1978年5月22日，总政治部签发三份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

这三位“病故”军人是：李平、邵起良、张延奎。

熟悉九一三事件的朋友都知道，这是256三叉戟上的三位机械师。

当过飞行员的朋友都知道，飞行员有一点点小病，都是不能飞行的，更不要说为当时中国的一号专机飞行了。

这三位机械师身强力壮，怎么能算病故？

1978年春夏之际，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重新主管中央军委工作。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平反冤假错案时，邓小平说：清查“四人帮”体系。林彪的问题也要重新审理，在揭批“四人帮”中必须联系林彪。

这样，总政治部重新翻开林彪案卷，发现没上飞机的五位256三叉戟机组人员已经被处理复员，而四位已经殉职的机组人员还悬着。对他们怎么处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处理者认为肯定不能算烈士。张延奎的家人被告之，就按病故。之前张延奎一直被当成叛国、反革命，家人早就胆战心惊了，现在能给一张《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谁还敢再多问一句为什么。

张延奎终于被承认革命军人了，但是张延奎父母只得到200元抚恤金，却仍然没有享受到每月应该得到的几十元补助。上边说，等着吧，县民政局会找你们。一直等到1991年，仍没有人上门。张延奎家人托人四处找，才最终找到补助，但以前的不给补了。张延奎的父亲才领到几年的补助，就去世了。

张延奎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军队，一直是优秀学生和战士。小学、初中他都是学校的尖子，平时老实极了，只知道学习，别人打他骂他，他从不还手还口，也不跑，任人打任人骂。1959初三上半年，张延奎等50名同学到沧州体检飞行员，只有两位同学进到复查，但最后也被打发回家。张延奎初查就被刷下来，腿上有一个小包。下半年初中毕业，全校只有张延奎一人被保送沧州师范学校。1961年上半年，张延奎再次体检飞行员，这回顺利通过。1961年6月，张延奎和沧州师范同学于景瑞一起进入空军航校，之后又一起分到空军34师，同在沙河机场当机械员，负责里二飞机的保养。当兵十年，张延奎只回家一次，20天假他只休了七天，就急着要回部队，说别人保养他的飞机他不放心。张延奎的单位年年寄一张奖状回来，家人一直以他为自豪。

1970年中国引进四架三叉戟，张延奎和于景瑞又一起被调到100团，张延奎担任2

5 4 三叉戟空勤机械师，于景瑞担任 2 5 6 三叉戟空勤机械师。四架三叉戟都是旧飞机，2 5 4 三叉戟飞的时间最短，本来是把 2 5 4 三叉戟作为林彪专机的，但发现 2 5 4 三叉戟的机头被小鸟撞了一个坑，于是林彪专机就换成了 2 5 6 三叉戟。1 9 7 1 年 8 月中旬，2 5 6 三叉戟空勤机械师于景瑞到庐山疗养。9 月 1 2 日，2 5 6 三叉戟从西郊机场到北戴河时，就临时换上了张延奎。

张延奎事先并不知道，9 月 1 2 日这个星期天他是准备回家的。他结婚还不到一年，爱人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上班，家安在城里的一间小平房里。屋里又潮又暗，天又渐渐冷了，而爱人这时已经怀孕，张延奎说被子太薄，我从机场带一床被子来，合在一起。爱人左等右等，9 月 1 2 日张延奎没有回家，而且以后也没有了消息。

在四位牺牲的飞行员家属中，我最先找到的是飞行员潘景寅的家属。潘景寅是 1 9 8 0 年 1 2 月 2 3 日才发给《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比三个机械师晚了两年多。要不是潘景寅家属凭着邓小平“飞行员是个好人”的一句话，这个病故通知书也拿不到。3 4 师有关复查组的人说：因公通知书没有了，我们这个复查组马上要解散，你就签了吧。潘景寅家属就签了。

潘景寅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是这样写的：潘景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而张延奎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是另一个版本：张延奎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温都尔汗（汗）随机坠毁死亡。除由我军妥善安葬悼念外，特向革命家属表示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发扬革命传统，将革命进行到底。并向山东省庆云县革命委员会申请抚恤，享受病故军人家属优待。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这张《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非常矛盾，到底张延奎是随机死亡，还是病故？至今又过了 3 1 年，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应该给张延奎和另三位飞行员烈士称号。

既然张延奎的病故通知书上说“我军妥善安葬”，那就理所当然应该由中国政府向蒙古要回张延奎等三位机械师的遗骨，安葬在他们本人的家乡。

2 0 0 9 年 1 0 月 3 日，正值八月十五的晚上，我走出张延奎家人的大门，看见满天莲花般的云朵，一轮磨盘大的圆月正在云中穿行。微风从枣林吹来，我想云是遮不住月的。

#### 2 4、英国三叉戟是如何进入中国的？

1 9 6 1 年 8 月 4 日，哈特菲尔德出厂第一架三叉戟 1 E 型，1 9 6 2 年 1 月 9 日试飞。1 9 6 3 年初，四架三叉戟投入试飞计划。1 9 6 5 年 1 1 月三叉戟 1 E 型获得适航证，陆续生产 1 5 架，其中四架 1 3 9 座。主要用户有科威特航空公司、伊拉克航空公司、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锡兰航空公司和塞浦路斯航空公司。

三叉戟（T r i d e n t）是英国霍克西德利公司（后并入英国宇航公司）生产短、中程喷气客机。为什么叫三叉戟？飞机设计了三套独立的飞行控制系统和三台 R B 1 6 3 - 2 5 M K 5 1 1 - 5 喷气发动机、单台推力 5 0 . 7 千牛。三叉戟 1 E 型设计现代，发动机后置，机翼外形干净。机翼前缘后掠 3 5 度，这是当时商业飞机的最大后掠角。它的总体设计也很新颖，机尾 3 台涡轮风扇发动机。机舱内噪声很小。因为发动机的推力线靠近机身轴线，当一台发动机失效时，造成的偏航力矩也较小。所有飞行操纵都是动力操纵，由三套完全独立的液压回路

执行，每一套压力系统由一台马达驱动。机翼外各有两副机轮的主起落架可以机翼主梁为轴翻转，先翻转90度和伸长15厘米，然后再收入机身，而不是收入机翼下表面。双前轮向左偏置，并且侧向收放。所有燃油箱都置于机翼中。三叉戟可在满油出航后不久，再飞几个短程航段后再重新加油。

50年代末，中国民航引进第一批伊尔-18和子爵号飞机，主要用于专机飞行，1970年7月20日，毛泽东从武汉紧急飞到上海，就是坐的伊尔-18，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坐飞机。子爵号有四台螺旋桨，是当时中国最高级的飞机，因50年代末中央决定毛泽东不再乘坐专机，子爵号就作为林彪专机。那时美国封锁中国，中国买不到先进飞机。巴基斯坦则购买了几架比三叉戟更先进的波音，不想再用三叉戟了。经协商，7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从巴基斯坦转口四架旧三叉戟用作公务专机。潘景寅带队到广州改装，由巴基斯坦飞行员带飞。1971年夏，子爵号淘汰，林彪专机确定为三叉戟。254三叉戟是巴基斯坦总统座机，但因为飞行时机头被小鸟撞过，不能再作为一号专机，于是决定改装256三叉戟。四架三叉戟已经在巴基斯坦飞过好几年，一些机件老化，必要的备件买不到，只好拆东墙补西墙。西郊机场修理厂和256三叉戟机械师一起，开始大规模维修。四架三叉戟的飞行时间不一，把另几架三叉戟好的零件拆给256。除把普通客舱拆掉，隔出单间，设置卧室、办公室外，还按林彪怕风、光和绿颜色的习惯，精心布置机舱，整整改装了三个月。

1971年9月6日，256三叉戟才最后改装完毕。

九一三事件后派到34师的总政工作组成员刘岩回忆：1971年8月潘景寅试飞，去过山海关，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月11日，潘景寅再飞东北航线，经沈阳二台子机场，再到长春，接回在长春解放军医院治疗小儿麻痹的大女儿。有人看潘景寅情绪不好，询问他。潘景寅回答说飞机落地还是不理想。9月12日傍晚，林立果坐256三叉戟从西郊机场到山海关机场，9月13日凌晨林彪第一次坐三叉戟1E型，机毁人亡。

中国进口的三叉戟中，至少有三架三叉戟机毁人亡。除256三叉戟摔在蒙古温都尔汗外，一架三叉戟借给中国民航，飞往桂林，机上100多位中外乘客，飞机在落地时撞山，所有机上人员全部身亡。另一架摔的三叉戟是34师一位机械员，因为没有提干，他私自开动三叉戟，飞机拉起时摔在西郊机场跑道南头。

英国航空公司共生产三叉戟117架，中国陆续购买35架。1972年11月13日，第一架三叉戟2E从英国飞往中国，四天后到达广州机场。三叉戟2E的主要用户是中国民航，它是1E发展型，1968年2月交付使用，共生产50架，中国购买20多架。从1974年起，中国民航从北京、上海和广州始发的15条国内航线陆续改用三叉戟，替换原来使用的伊尔-18和子爵号。到三叉戟2E型，更加先进，翼展增大1.58米，装有全翼展前缘缝翼，载油量增加，航程增大，可载115名乘客，是世界上第一种能在恶劣气象条件下具有全自动着陆能力的民航客机。1991年10月31日，中国民航的三叉戟全部退役。

25、邓小平为什么说256三叉戟飞行员是个好人？

1980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下角刊登新华社电：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和夫人，回答了客人提出的问题。11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一版《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

正值中国审判“两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问：“根据调查，飞机失事是自然的故事，是由于飞机维修不好呢？还是别的原因？”邓小平回答：“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这段对话，表面看邓小平所问非所答，人家美国记者明明问的是飞机失事原因，而邓小平回答的却是飞行员是个好人。但细一想，邓小平的回答也没错，虽然没有正面回答飞机失事原因，也算是不是回答的回答。邓小平排除了飞行员潘景寅的问题。也许邓小平还不知道，自从1978年春夏他提出复查林彪一案后，256三叉戟上的三位机械师都平了反，而潘景寅家属仍戴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凭着邓小平“飞行员是个好人”这句话，经过潘景寅家属一年的上访，潘景寅也得到了一张《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

虽然邓小平是“个人判断”，但一言九鼎，“解放”了潘景寅和他的家人。

邓小平说的“另一架飞机”，是34师的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以生命为代价飞回来。虽陈修文被公认英雄，但也一直悬着，追悼会一直未开，陈修文的骨灰只能保存在34师干部科的档案柜里。1978年陈修文家属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写了一封信。1978年12月7日，中央军委授予陈修文“忠诚战士”称号。空军领导机关在北京举行了命名大会，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空军政委高厚良在大会上解释了为什么时隔七年才授予陈修文称号：1973年党中央就指出，空军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陈修文烈士在林彪死党逃跑的直升机上，勇敢地同叛徒搏斗，就是一个范例。九一三事件后，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曾多次指示要宣传陈修文同志的英雄事迹，但被“四人帮”蓄意阻挠破坏，以致对陈修文同志的命名和宣传延隔多年。

九一三事件中两位驾机起飞的飞行员性质是一样的吗？

有人说：邓小平搞错了，另一架直升机和256三叉戟的性质不一样，直升机被飞行员陈修文飞回来了，没有飞到蒙古。而256三叉戟飞进蒙古，虽然机头方向朝着中国，但毕竟是坠毁蒙古温都尔汗。

那么邓小平凭什么说256三叉戟“飞行员是个好人”？

当然，三叉戟主要是林立果看上的，不是林彪看上的。1958年林彪还没到军委工作，坐飞机到昆明疗养。他觉得飞机比较好，又快，从那以后就开始坐飞机了。以前林彪的专机是英制“子爵号”。1970年中国从巴基斯坦进口的四架英制三叉戟，这是中国第一次拥有的大型客机。它航程长，可以从北京直飞海南岛、广州。一投入使用，就“马不停蹄”，中央领导开会都喜欢坐。江青坐得最多，邓颖超、谢富治、丁盛、湖南第一把手华国锋都坐过。34师100团政委安治梁说，确定三叉戟给林彪，时间不长。9月6日，256三叉戟改装好，被固定为林彪专机。随着飞机改装，进行人员选拔。机组是专门挑的，都是100团最拔尖的人物。就那几个飞行员，团党委提出意见，报师党委批准，执行专机任务不是一年半年，谁技术怎么样也摸底，政治审查也常常进行。这一次执行任务，领导上掌握，和飞机一样，人员也有备份，256三叉戟的备份是副团长李克修。机组早就组建，没任务飞别的飞机，拉别的首长。临时有变动，不是固定的。最后一次飞往北戴河，三叉戟飞行员中的一、二、三号种子全去了。第二副驾驶康廷梓有经验，一看加油量就知道是飞广州。

林彪专机，和别的专机不一样，需要特别改装。要按照林彪的生活标准，隔出单间，安上一张床。搞好后林彪夫人叶群来验收，说这床首长很满意。还要保持舱内一定的温度，多少度，

穿多厚，单间怎么保持温度，都有讲究，前后左右全是温度计。镜子也要仔细贴上乔其纱。洗手间的台灯要一开就亮，专门为林彪设计的变速灯，罩上绿金丝绒，光特别暗，所有的管子都要包上。林彪在飞机上很少吃东西，也很少说话，上来讲一句，下去讲一句，例行公式一般。林彪握手软绵绵的。目睹林彪上专机的人说，现在看，好多事林彪不一定知道。他身体不行，面黄肌瘦。到机场，坐汽车来，车停在飞机门口，很热的天，用风衣蒙着脑袋，有风时还把叶群的头巾蒙在头上。从汽车里出来要扶下来，再由两个警卫员架着上飞机。而最后一次上飞机，什么也不顾了，9月中旬的北戴河已经很冷，林彪光着头，帽子从床上拿起来了，都没来得及戴。

如果说林彪都不知道，给林彪开飞机的潘景寅能知道吗？

邓小平也是常坐专机的人，他知道飞行员就和自己的司机一样，上了车才告诉到哪里，司机怎么能知道首长什么事？更何况256三叉戟如此紧急，他推断飞行员潘景寅不知情。

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256三叉戟机毁人亡，当时周恩来、毛泽东等得知后眉开眼笑，认为这是最好的结局。

所以，不管坠毁的主观还是客观原因，邓小平都认为飞行员潘景寅是好人。

（未完待续）

□ 选自 舒云\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y2222196>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